



委内瑞拉农业面临的主要挑战

作者：弗朗西斯科·F·埃雷拉

导言

由城乡居民各部门主导、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管理方案在委内瑞拉出现并巩固，这有利于国家法律框架和政治行为体的转型。该现象始于1999年查韦斯就任总统，主要因起草新宪法而得到推动。这一里程碑在该国历史上标志着国家粮农模式改革阶段的开始，该模式延续了一个世纪以来由石油收入决定的政策。

二十年来，农业经历了动荡转型，其中不乏紧张、矛盾和阻力，因此有必要反思一些值得关注的挑战。显然，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技术和文化主权的可持续粮食生产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下文介绍了需要考虑的三个基本挑战：委内瑞拉农业近代史中暗含的程序惰性及其在科学—工业模式中的影响；该国在一个世纪的石油文化之后的人口结构；全球、地区和地方生态系统条件不可否认的转变将决定该国农业生产的真正潜力。这三个方面并不是粮农主权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但从公共政策和民众参与来看，它们是近期需要理解和考虑的关键节点。



挑战1: 石油文化

石油开采和商业化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在委内瑞拉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此之前,委内瑞拉经济主要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几十年间,社会在石油财富的作用下,遵循因之而来的进步和现代化模式,围绕城市进行了重组。农业活动急剧下降,农民的生产方式和殖民地庄园模式被美国在**20世纪中叶**推行的农工业模式所取代。这一现象带来了巨大变化,例如:**1)**粮食进口政策和资本密集型农业实践占主导地位;**2)**农民从农村向城市和油田大规模迁移;**3)**创建农学院,旨在为机械化农业和工业化食品加工培训人才;**4)**巩固以庄园农业时期的旧地主为基础的农工业城市小资产阶级。委内瑞拉农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行全面变革,尤其是在学术和政府机构中将传统食品生产和消费形式抛在一边,使城市人口回归农业和农村生活:这种现象被称为石油文化(Quintero, 1972)。

货币通胀、引进国外技术、以及私人资本和国家官僚机构相结合使粮食分配不再依赖于国内农业生产。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由石油收入大力补贴的中等规模农工业部门将与非常有限且边缘化的农业活动并存(Herrera等, 2017)。该国将转而依赖粮食进口。

农工业模式有利于新式农业活动。这种活动技术性与依赖性并存,并由中大型土地所有者组成。对于农民来说,生产效率不高或不被市场青睐的土地会被降级。在土地分配方面,**20世纪末**,大地主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5%**,拥有**75%**的土地;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拥有**6%**的土地(Purcell, 2017年)。

从那时起,对石油的依赖就成为该国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特点,甚至引发了内忧外患。因此,粮食安全以及最近的粮食主权一直成为国家政治叙事中反复出现的议题。

挑战2: 国家当前的人口结构

委内瑞拉与乌拉圭和阿根廷一样,是南美洲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主要缘于上世纪的国内移民,这是资本在少数城市积累和流通的结果,也是农村缺乏经济动力的结果。如今,仅**5座城市**就集中了约**34%**的全国人口,而居民超**10万人**的城镇覆盖了总人口的**81%**。

该国人口约**3000万**,主要分布在水资源匮乏且粮食主权水平较低的加勒比海沿岸,更容易受到气候不确定性和影响粮食系统(生产、进口和分销)的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该国人口密度较低地区河网水流量大,面积约**3000万公顷**的最优质土壤分布在山区斜坡和奥里诺科平原上。其中,**60%**以上适合粗放型畜牧业,约有**700万公顷**适宜蔬菜种植,其中一半面积用来种植机械化作物(玉米、水稻、高粱、豆类和棉花)。农业生产从业人口不到**5%**,整个农工部门估计仅占**14%**。

小农农业虽然因与小生产者相似而难以界定,但据估计,其从业人数在**60万到90万**之间,且将是唯一可以拥有完全粮食主权的类别。另一方面,特别是在过去十年,城市农业运动



得到蓬勃发展。其范围从一些必需品和短周期产品的生产发展到包括小型畜牧业、温室大棚和当地市场在内的高度组织化生产活动(Alban等, 2017)。这些数据表明, 委内瑞拉的粮食生产主要与谷物、豆类 and 动物蛋白相关的私营农工部门和与园艺和水果作物等相关的农民和小生产者有关, 且粮食短缺通常通过进口来弥补。同样, 数据也明确显示该国绝大多数人口不仅不从事粮食生产, 且距主要粮食生产点甚远。这揭示了为什么在该国近年的政局中, 粮食已成为政府与国内私营工业部门之间关系紧张或与外国发生利益冲突的因素: 两种情况都印证了粮食脆弱性较为严重。

挑战3: 地球正在迅速变化

除了石油文化和城市人口过多造成的紧张政治局势之外, 另一个实现粮食主权过程中面临挑战是全球环境危机。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为气候变化或气候危机, 但其影响范围远超气候范畴: 它涵盖土壤、水循环、海洋生物、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地球氮磷循环失衡或破坏等复杂方面(Herrera等, 2018)。这正使地球生存条件产生令人震惊的变化, 必须指出, 农业只不过是一个经过改造的生态系统, 目的是在选定条件下不断维持自身。因此, 农业与地球生物化学循环的动态交织不可避免, 任何忽视这一现实的企图都不负责任。

从生态角度看, Rockström 等人(2009)撰写的论文《人类安全运行空间》或许是揭示当下地球环境危机深度的论文之一。这篇综述展示了当代人类活动如何深刻影响地球生态系统, 以至于我们已经开始逾越其中一些系统的可接受极限, 即阈值。由于其清晰反映了危机规模, 此方法在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基础是, 地球正在出现过去一万年都不曾出现过的全新生物物理条件, 而突破这些阈值将产生与人类整个历史经历相左的变化, 并对人类农业和定居产生更大影响。这会让我们陷入地球生态未知数, 淡水、沃土、渔业、授粉昆虫等曾经丰富的生命之源都将枯竭。作者认为, 我们已经逾越生物物理子系统的极限, 其后果难以预料, 可能导致物种灭绝、全球氮磷循环失衡。同样, 我们也愈发接近淡水获取、土地利用、海洋酸化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极限。

毫无疑问, 生活条件恶化将加剧局部冲突、资源强占和大规模移民, 而其影响才刚刚开始纳入考虑(UNCCD, 2017)。毫不夸张地说, 我们正面临迫在眉睫的全球环境危机。其规模令人震惊, 后果难以预测。因此, 要实现促进粮食主权的替代方案, 就必须深刻理解此现象的根源。就委内瑞拉而言, 在阐明根源前应当认识到其过往农业政策所致惰性以及国家愿景对其人口结构的影响

政治和伦理选择



基于对国家农业政策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合理性和责任，一个必要的替代方案是将任何有关农业食品的方案、项目、国际协定或国家计划从可持续性和主权两方面筛选。此双重筛选适用于与强调农业模式变革潜力的内外部多方对话，它将在21世纪进行一场带有许多过去象征意义的讨论。而在当下的地球生态时代，这些象征意义已逐渐不合时宜。

不评估可持续性(通过指标的应用和解释)的风险在于忽视农业生态系统的社会生态能力。这种疏忽可能会产生中长期影响，如粮食减产、地区性贫困或移民现象加剧、水资源或沃土稀缺引发的局势紧张等。此外，还可能错失制定农业食品系统规划的机会。该体系能识别农工业模式失误并同时为生态系统变化做好准备。

毫无疑问，地球环境危机的严重性并未被大多数人理解或接受。否则，公共政策和发展计划就会朝着其他方向制定。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为从本质上说，这一制度是从对自然的非理性剥削中发展起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决定了全球环境危机。因此，面对资本主义的崩溃，期望从其内部提出解决环境危机的可行替代方案是一种战术性错误，其后果难以预料。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可参照案例，但我们有更多选择：我们拥有丰富的参照系和多种备选方案。传统形式、习俗、集体记忆、身份认同、宇宙观，在全新的危机面前显得弥足珍贵。它们与农业生态混合体(科学思维——农民思维)相结合，在理性上比企业和技术科学提供的方案更加协调连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城乡人口比例失衡在委内瑞拉仍待解决。

另一方面，加强全球和地方农业食品模式的可持续性不仅合理，更迫在眉睫。有大量证据表明，生态学作为资本主义的环境表现(Herrera等, 2018)，是对抗发展模式及当前新自由主义(Rockström等, 2009)堡垒的少数空间之一。不能再娓娓道来、空洞无物、纸上谈兵了；必须在民众参与下对其进行展示、测试、衡量和评估。本文建议使用社会生态复原力、生命周期评估(与农业食品有关)或生态足迹等工具。这些工具可以为可持续性等范围甚广但很少呈现或量化的变量提供量化参考。

最后，必须假定国内政治和认知方面的紧张局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停止。需要意愿更强和更多认识地球环境状况，以及广泛且民主的辩论，才能走上彻底变革之路。国家必须对这一历史时刻有连贯认知。委内瑞拉境内外的经济体系正在崩溃，而经济体系中的强势方对领土的争夺促使我们加强社会基础并使社会成员能够直接获得生存条件。这正是水、土壤、种子、政治组织和信息起决定性作用之时。政治组织和对历史关头的认识是渴望实现粮食主权的民众之基本要素。

参考文献



1. Alban, R., Arteaga, M. y Herrera, F. (2017). La agricultura urbana en Caracas: diagnóstico de los espacios agro productivos desde una perspectiva socioecológica. *Cuadernos de Desarrollo Rural*, 14(80): 1-19.
2. Herrera, F. F., Domené-Painenao, O. y Cruces, J. M. (2017). The history of agroecology in Venezuela: A complex and multifocal process. *Agroec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41 (3-4): 401-415.
3. Herrera, F. F., Lew, D. y Peña, E. (2018). La ecología académica en América Latina ante la crisis ambiental I: elementos históricos constitutivos de su posicionamiento actual. *Interciencia*, 43 (11): 799-807.
4. Purcell, T. F. (201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ier capitalism and the limits to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in Venezuela.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17: 296-312.
5. Quintero, R. (1972) *Antropología del petróleo*. Siglo XXI Editores.
6. Rockström, J., Steffen, W., Noone, K., Persson, A., Stuart III Chapin, F., Lambin, E., Lenton, T. M., Scheffer, M., Folke, C., Schellnhuber, H. J., Nykvist, B., De Wit, C. A., Hughes, T., Van der Leeuw, S., Rodhe, H., Sörlin, S., Snyder, P. K., Costanza, R., Svedin, U., Falkenmark, M., Karlberg, L., Corell, R.W., Fabry, V. J., Hansen, J., Walker, B., Liverman, D., Richardson, K., Crutzen, P. y Foley, J. (2009).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Nature*, 461: 472-475.
7. UNCCD (2017) *The Global Land Outlook*.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Bonn, Alemania. 337 pp.